学术专论

梁启超与“中华民族”一词产生问题新探

刘煜泽

[摘要]　梁启超于1902年最早使用“中华民族”一词为学界所公认，而本研究则表明，“中华民族”一词早在1898年已经出现。1897年梁启超于上海《时务报》刊载《论中国之将强》，1898年日本东京《东邦协会会报》用日语译载《论中国之将强》，其中将“华种”日译为汉字词“中华民族”，首次使用“中华民族”一词。随后，1902年梁启超首次于汉语文献之中使用“中华民族”一词。“中华民族”一词出现的根本原因，主要有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发展，中华民族的认同逐渐形成，中国逐渐发展成为现代民族国家，“nation”等概念亦传播，社会发展对词汇发展产生需求。在此基础上，“民族”一词逐渐具备了“nation”等现代含义，进一步可以同“中华”等相关词语组词。20世纪初，“中华民族”一词首先较多在部分旅日华人之中使用，民国建立之后，“中华民族”一词正式开始在中国本土使用及传播。

[关键词]　中华民族　梁启超　《论中国之将强》　《东邦协会会报》　东邦协会

[中图分类号]　K257　[文献标识码] A　[文章编号] 1002－8587（2026）－02－0127－008

“中华民族”一词地位甚为重要，对其历史的研究，具有较大的历史与现实意义。学界之中，向来对于该问题颇为关注，尤其是近年来，研究较为活跃，目前已有极度丰富且质量甚高的研究成果。[①] 但是，迄今为止，梁启超于1902年首次使用“中华民族”一词作为定论而通行，从未有研究注意到“中华民族”一词最早在1898年已经出现。不仅如此，19世纪末20世纪初，“中华民族”一词的产生及初步传播，有着非常复杂的过程，而现今对该过程研究程度不足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，“中华民族”一词是在近代中日文化相互影响之下出现的，而现有研究，非常不重视日语材料的使用。有鉴于此，本文将在前人研究基础上，使用《东邦协会会报》《时务报》《新民丛报》等近代中日报刊为核心的近代中日文献，以1898年“中华民族”一词最早出现为中心，基于近代中日文化相互影响的主题，深入分析“中华民族”一词产生的过程。

[收稿日期]　2024-05-06
[作者简介]　刘煜泽（1993—　），男，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、校聘副教授，太原030006，838471543@qq.com
[基金项目]　国家社科基金项目“内生制度变迁视角下国家—地方治理演进的历史经验与实证研究”（22BJL029）阶段性成果。

① 黄兴涛：《现代“中华民族”观念形成的历史考察——兼论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认同之关系》，《浙江社会科学》2002年第1期；黄兴涛：《重塑中华：近代中国“中华民族”观念研究》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17年；郝时远：《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内涵之演变》，《民族研究》2011年第4期；都永浩：《辛亥革命前后的“中华民族”概念》，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》2012年第3期；石硕：《从中国历史脉络认识“中华民族”概念》，《清华大学学报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》2021年第3期。

一、1898 年“中华民族”一词最早出现

（一）“中华民族”一词出现的背景

“中华”一词始见载于西晋末期。古汉语中的“中华”，是一个综合性的涵盖区域、文化、民族等方面的概念，狭义方面，指中原、中原文化、汉族、华夏族等；广义方面，为中国另一名号，亦作为一个比较宽泛的文化概念，凡属中国传统文化，或认同中国传统文化者，亦可称“中华”。① 汉语中“民族”一词古已有之，古汉语“民族”的含义，既指宗族之属，又指华夷之别。宗族之属包括了泛指的民众，也包括了相对于“皇族”的“贵族”“世族”“巨族”之类。华夷之别，包含了区别“五方之民”（蛮、夷、戎、狄、华夏）的意义。②

随着近代西方民族主义思潮的发展，民族国家率先于西方兴起，随着西方民族主义思潮的扩散，民族国家大力发展，“nation”等概念亦大力传播。近代化发展较快的日本，亦逐渐发展成为现代民族国家，社会的发展对词汇的发展产生了需求。日语亦使用汉字，亦有“民族”一词。近代时期，日语“民族”一词逐渐具备了“nation”等含义，被赋予了现代意义，进一步产生相关词语，例如 1888 年日语刊物《现社会》中使用汉字词“日本民族”。③

随着中西接触，汉语逐渐接触“nation”等概念，例如 1848 年麦都思的《英华字典》之中，收录“nation”词条，翻译为“国”“邦”“邦国”“国家”等。④ 同时, 19 世纪前期，汉语中的“民族”一词已经具备一定“nation”等现代意义。近代，随着民族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发展，中华民族的认同逐渐形成，中国亦逐渐向现代民族国家过渡。一方面，19 世纪末期，汉语主要受到日语影响，逐渐流行接受了具有“nation”等含义的“民族”一词。⑤ 另一方面，西方及日本，逐渐开始使用“nation”等概念来理解中国，譬如 1897 年日语书籍《文天祥》使用汉字词“中国民族”。⑥

（二）1898 年“中华民族”一词的出现

1896 年，梁启超等于上海创办《时务报》，梁启超作为主笔之一。1897 年 6 月 30 日（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初一日）发行的《时务报》第 31 册，首次刊载梁启超的《论中国之将强》，其中内容有：

> 余读西报，其訾中国之国政纲纪官吏，盖数十年以来矣。去岁八九月以后，乃更明目张胆，昌言华种之野犷，华民之愚诈，华教之虚伪。⑦

日本东邦协会于 1891 年成立于日本东京，为亚洲太平洋地区研究团体，较为关心中国问题，发行会刊《东邦协会报告》，1894 年 8 月改为《东邦协会会报》。1898 年 4 月 19 日印刷、20 日发行的《东邦协会会报》第 45 号，日语译载梁启超的《论中国之将强》，日译名为《中國の將さに強からむとするを論ず》，上一段之中的汉语内容日译如下：

> 是れより先き、歐人新聞が、中國の風俗國政を詆毀誹謗すること固とより久しと雖ども、日清戰後に及びて、其誹謗罵詈益々急劇を加へて止まず。曰く『中華民族は獷野也』。『中華

① 王树民：《中华名号溯源》，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》1985 年第 1 辑；石硕：《胡入中华：“中华”一词的产生及开放性特点——东晋南北朝至隋唐胡汉融合与“中华”词义嬗变》，《清华大学学报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》2022 年第 4 期。

② 郝时远：《中文“民族”一词源流考辨》，《民族研究》2004 年第 6 期。

③ 田中迪三：《日本民族の覺悟》，《現社會 1》，1888 年，第 201 页。

④ Medhurst, Walter Henry, *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, vol. II*, Shanghae, The Mission Press, 1848, p. 870.

⑤ 郝时远：《中文“民族”一词源流考辨》，《民族研究》2004 年第 6 期；黄兴涛：《清末现代“民族”概念形成小考》，《人文杂志》2011 年第 4 期。

⑥ 国府犀東：《文天祥》，政教社，1897 年，第 10 页。

⑦ 新会梁启超撰：《论中国之将强》，《时务报》第 31 册，1897 年。

の民族は愚にして詐』。『中華の教は虚僞のみ』と。[①]

上述日语译作现代汉语如下：

> 在此之前，欧洲人的报纸，虽然对中国的风俗国政进行诋毁诽谤已甚久，而甲午战争之后，其诽谤谩骂愈演愈烈，称："中华民族粗犷野蛮"，"中华的民族愚蠢狡诈"，"中华的宗教只有虚伪"。

如上所见，1898年《东邦协会会报》日语译载《论中国之将强》，将《时务报》的《论中国之将强》汉语原版之中的"华种"日译为汉字词"中华民族（中華民族）"，为现存文献之中首次使用"中华民族"一词。同时，又将"华民"日译为"中华的民族（中華の民族）"。"中华民族"一词确实最早出现在梁启超的文章之中，但并非梁启超最早使用，1898年《东邦协会会报》的《论中国之将强》的日译方面，最早使用"中华民族"一词。

二、1898年"中华民族"一词的出现过程

（一）《东邦协会会报》译载《论中国之将强》的过程

就《东邦协会会报》译载《论中国之将强》的原因而言，本文认为，当时中国维新事业开始产生较大影响，开始得到关注，东邦协会进而同维新派接触，以及对维新派较为认可，是《东邦协会会报》译载《论中国之将强》的根本原因。1898年2月，东邦协会会员川崎紫山在北京期间同康有为"日夕往来"。1898年3月21日，川崎紫山在写给东邦协会的通讯之中，对康有为评价较高，并直接提到《时务报》的主笔梁启超为康有为门生。而1898年4月《东邦协会会报》第45号除了译载《论中国之将强》外，同一号亦载川崎紫山通讯，题为《北京及天津的清国有志人士的意向》，显示出东邦协会对维新派的认可。[②] 至于《东邦协会会报》选择译载梁启超的《论中国之将强》的原因，现在没有看到明确记载。据笔者推测，首先，出自维新派人士之手的、正面反映维新派的理想抱负的文章，符合当时东邦协会及《东邦协会会报》的需求，而由于梁启超身处北京参与维新事业，作为维新派代表人物，其所作《论中国之将强》自然能被译载。其次，《论中国之将强》出自《时务报》，《时务报》在当时是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报刊，亦可能成为影响因素之一。

相较于《论中国之将强》汉语原版载作者信息为"新会梁启超撰"，[③]《论中国之将强》日译版作者信息仅载"广东梁启超述"，[④] 没有记载译者。同时，梁启超的《论中国之将强》一文如何被《东邦协会会报》流传、翻译及刊载，没有任何直接记录。《东邦协会会报》译载《论中国之将强》的过程，只能通过其他间接线索进行分析。通过分析种种线索可知《东邦协会会报》日语译载《论中国之将强》为《东邦协会会报》单方面主导的行为，梁启超没有介入。

就上文所见作者名称之后的"述"而言，通过分析《东邦协会会报》各号刊文可以发现，"述"多出现于译文，表该文原作者。对于译文而言，少部分译文会记载译者，这些译文明确是《东邦协会会报》以外的外部人士翻译，如"舌犹存书屋主人译述"。[⑤] 大部分译文不载译者，译文视《东邦协会会报》单方面需求而译载，主要是来自《东邦协会会报》方面的翻译。不排除《东邦协会会报》请人翻译的可能性，但相较之下，《东邦协会会报》较为关注中国问题，此前常刊载关于中国的文章，亦常译载汉语文章，这样的刊物理所当然会配备自己的汉语翻译，只

---

① 廣東梁啓超述：《中國の將さに強からむとするを論ず》，《東邦協會々報45》，1898年，第83页。

② 紫山生：《北京及び天津に於る清國有志士人の意嚮——日本に對する清國名士康有爲氏一派感覺》，《東邦協會々報45》，1898年，第141–142页。

③ 新会梁启超撰：《论中国之将强》，《时务报》第31册，1897年。

④ 廣東梁啓超述：《中國の將さに強からむとするを論ず》，《東邦協會々報45》，1898年，第82页。

⑤ 舌猶存書屋主人譯述：《ゴルチャコフ侯》，《東邦協會々報46》，1898年，第46页。

是相关人员身份不详。

《论中国之将强》日译版的直接相关信息不足，但可以通过分析《东邦协会会报》所刊其他类似文章进行研究。1898 年 5 月发行的《东邦协会会报》第 46 号之中，以《中国革新策》为名日语译载康有为的上书，该文献亦是维新派作品，内容性质相同，时间仅相隔一号，应该经历了相同的译载过程。《中国革新策》虽同样未载具体译者，仅载“清国广东南海康有为述”，但有“编者”和“译者”的相关注释。其中，开头的“编者谨识”称当时旅日的康有为门生徐勤向副岛种臣赠送康有为的《上书记》，“通过该上书足以推量汉族名士的志望，故而抄译其中一二，录于下文”。通过该句话可见译载《中国革新策》的原因，与上文所分析的译载《论中国之将强》类似，进一步可以发现，《中国革新策》的翻译工作由《东邦协会会报》单方面主导而进行，认为该文献有价值，随即因其需求而直接译载，没有作者方面介入。《中国革新策》结尾的“译者谨按”，有对康有为的名称“康祖诒”注释，内容为推测康有为原名为康祖诒，随后才改名康有为。可以得见，《东邦协会会报》方面的相关翻译，连维新派主要领导人的名称问题都需要推测，进一步说明在翻译该文章方面，《东邦协会会报》方面没有同康有为方面，甚至维新派方面系统接触，更没有深入的联系，译载行为完全系《东邦协会会报》单方面行为。①

进一步，种种迹象亦明显表明，梁启超没有介入《东邦协会会报》译载《论中国之将强》的过程。梁启超当时并不会日语，在渡日之前，同东邦协会方面没有联系，据此来看，《论中国之将强》不可能为梁启超翻译，或参与翻译；并且，当时并没有严格的版权规范，《东邦协会会报》译载《论中国之将强》既跨国又跨语言，版权方面制约更小，译载可以不经过作者同意，可以是《东邦协会会报》单方面的行为。梁启超没有途径，也没有必要介入《论中国之将强》的日译。进一步，根据《论中国之将强》日译版的具体内容，亦可以对《东邦协会会报》译载《论中国之将强》的过程进行研究。首先，《论中国之将强》日译版之中，未得见从梁启超方面得到额外的信息与翻译指导，文章信息皆来自《时务报》，典型的体现就是《论中国之将强》日译版标题之后括附日期“光绪廿三年丁酉六月朔日”，② 即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初一日，这是 1897 年《时务报》第 31 册封面所载发行日期。其次，《论中国之将强》日译版之中，总体按原文原意翻译，但部分内容有主观性增删修改，例如增加小标题及其他内容，一些内容的翻译有悖作者原意，某些细节被直接修改，还有部分段落被直接删除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，部分内容的翻译基于日本立场，部分不利于日本的内容被删除，典型的体现就是将原文中日本于台湾的恶行内容删除，③ 又如文章之中的括注，对于原文一笔带过未明确提及的中国公使，直接括注为黄遵宪，详细介绍且评价较高，黄遵宪曾任中国驻日参赞，日方对其较为了解及关注。④

最后，《东邦协会会报》第 45 号的版权页的编辑者，仅载山方泰定一人，其于 1894 年、1897—1900 年担任《东邦协会会报》编辑，《东邦协会会报》第 45 号前后几号的编辑，皆载为山方泰定。但编辑应绝不止山方泰定一人，其应仅为主编，《东邦协会会报》其他号数显示，存在编辑会。⑤ 但是，山方泰定至少参与过《论中国之将强》的译载。

（二）《东邦协会会报》使用“中华民族”一词分析

日语亦使用汉字词“中华”。近世之前，日本知识界曾以“中华”自诩，对中国文化有着深深的仰慕和认同。而近世日本思想家却狂热地抬高本土文化的地位，持续地将对“中华”的认同和褒扬向着异化和贬损的方向扭转。近世日本思想家似乎撇清了自己与“中华”一词的干系，

---

① 清國廣東南海康有爲述：《中國革新策》，《東邦協會々報 46》，1898 年，第 28–46 页。

② 廣東梁啓超述：《中國の將さに強からむとするを論ず》，《東邦協會々報 45》，1898 年，第 82 页。

③ 廣東梁啓超述：《中國の將さに強からむとするを論ず》，《東邦協會々報 45》，1898 年，第 84 页。

④ 廣東梁啓超述：《中國の將さに強からむとするを論ず》，《東邦協會々報 45》，1898 年，第 84–85 页。

⑤ 《本會記事 編輯會》，《東邦協會々報 83》，1902 年，第 101 页。

使它最终异化成了专门指称他者中国的概念。①

近代中华民族的认同逐渐形成，中国亦逐渐发展成现代民族国家，相较之下，近代化较快的日本，这一进程更快。具备“nation”等现代含义的“民族”一词较早就在日语中流行。近代中日关系密切，日本亦逐渐使用现代“nation”概念理解中国，日语之中较早出现词语“中国民族”，作为中国重要名号的“中华”一词，较早在日语之中与“民族”组词，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有一定的必然性。

《论中国之将强》之中，与“华”组词的词语有“华种”“华民”等，据原文之中的“华民四万万”，可以得知梁启超所用“华”至少在范围上是涵盖中国的。② 当时日语汉字词“中华”含义前文已述，故而，《论中国之将强》日译版将“华种”“华民”之中的“华”译为“中华”，较为合理。此外，《论中国之将强》日译版之中，仍有两次使用词语“中华”，含义皆指中国。③

《论中国之将强》日译版，除前文之中的将“华种”及“华民”译为“中华民族”及“中华的民族”，又将另一处“华种”译为“中国人民”。④ 就“华种”一词的“种”而言，《论中国之将强》汉语版之中，使用相关词语有“种”“人种”“种族”“种人”，又有“白种”等；再就“华民”的“民”而言，《论中国之将强》汉语版之中，使用相关词语有“民”及“民士”。⑤《论中国之将强》日译版，将“种”“民”译为“民族”“人民”，可能翻译不太恰当。不过在另一方面，汉语及日语虽同样用汉字，但含义有隔阂，正是这种隔阂，给了日语很大的随意组词造词的空间。

最后，《东邦协会会报》1898 年第 45 号使用一次“中华民族”一词之后，随后 7 年内再未使用该词，4 年之内亦没有任何其他文献使用该词，可以得见，当时《东邦协会会报》使用“中华民族”一词，完全系随机组词偶尔使用，完全没有任何刻意重视，短期内亦未产生影响。

三、梁启超与 20 世纪初“中华民族”一词的初步传播

（一）1902 年梁启超使用“中华民族”一词与《东邦协会会报》

戊戌变法失败之后，梁启超流亡日本，1902 年 2 月于横滨创办《新民丛报》。1902 年 3 月 10 日发行的《新民丛报》第 3 号开始连载梁启超的《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》，1902 年 4 月 8 日发行的《新民丛报》第 5 号刊载《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》第三章《全盛时代》第二节《论诸家之派别》，于汉语文献之中首次使用“中华民族”一词，为现存文献之中“中华民族”一词的第二次出现，原文如下：

> 齐，海国也。上古时代，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惟齐。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：一曰国家观，二曰世界观。⑥

梁启超存在独立开始使用“中华民族”一词的可能性。但是，1898 年“中华民族”一词最早出现于梁启超作品的日译版之中，翻译过程梁启超没有介入，1902 年梁启超又最早在汉语文献之中使用“中华民族”一词，其间没有其他文献使用“中华民族”一词。如果 1902 年梁启超使用“中华民族”一词，同《东邦协会会报》方面没有关系，这样的巧合近乎不可能存在。1902 年梁启超使用“中华民族”一词，必然会受到《东邦协会会报》方面的影响，亦或是二者之间必然存在联系。

梁启超赴日之后，开始学习日语，大量阅读日语文献，对其产生巨大影响，“稍能读东文

---

① 张子青：《近世日本“中华”概念的异化》，《北京师范大学学报（社会科学版）》2018 年第 6 期。

② 新会梁启超撰：《论中国之将强》，《时务报》第 31 册，1897 年。

③ 廣東梁啓超述：《中國の將さに強からむとするを論ず》，《東邦協會々報 45》，1898 年，第 82-95 页。

④ 廣東梁啓超述：《中國の將さに強からむとするを論ず》，《東邦協會々報 45》，1898 年，第 91 页。

⑤ 新会梁启超撰：《论中国之将强》，《时务报》第 31 册，1897 年。

⑥ 中国之新民：《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》，《新民丛报》第 5 号，1902 年。

（日文），思想为之一变”。① 梁启超通过阅读日语文献，接触到了大量现代概念，日语词汇对梁启超的汉语用词产生了巨大影响，梁启超作品之中大量使用日语词汇。其中，梁启超逐渐接受了具备“nation”等现代含义的“民族”一词。1899 年梁启超发表《饮冰室自由书·论强权》，首次在其作品中使用“民族”一词。②1901 年梁启超发表《灭国新法论》，首次在汉语文献之中使用“中国民族”一词。③

另一方面，1898 年初东邦协会开始同维新派接触，随后，维新派影响力增加，东邦协会继续关注维新派，双方的联系初步发展，例如 1898 年 4—5 月维新派徐勤加入东邦协会。④ 梁启超旅日之后，于 1898 年 10 月 30 日致信东邦协会寻求支持。⑤1898 年 11 月 27 日，梁启超首次与东邦协会副会长近卫笃麿会面，随后双方不断发生联系，但不能单纯视为梁启超同东邦协会联系，时近卫笃麿亦担任贵族院议长等重要职务。⑥ 随后，可查知 1898—1899 年《东邦协会会报》两次刊载梁启超文章。⑦1899 年 11 月至 1901 年 4 月梁启超离日，这一时期未得见其同东邦协会有任何直接联系的记载。此外，可查知《东邦协会会报》不断收到梁启超所创办的《清议报》及《新民丛报》赠刊。⑧

随后，最值得本研究重视的事件发生。1902 年 1 月发行的《东邦协会会报》第 83 号显示，梁启超成为东邦协会新会员，在所有新会员之中列于首位，且是唯一一个无人介绍的新会员，说明梁启超具有一定特殊性。⑨《东邦协会会报》为月刊，每月 19 日印刷，故梁启超加入具体时间为 1901 年 12 月 19 日至 1902 年 1 月 19 日之间。同时，1902 年《东邦协会会报》再次刊载梁启超文章。⑩ 梁启超与东邦协会的关系开始达到最密切的时期，也就是在 1902 年，该年梁启超开始使用“中华民族”一词。

首先，梁启超成为东邦协会会员，并在《东邦协会会报》大量刊文，《论中国之将强》日译版是梁启超同东邦协会及《东邦协会会报》最早的重要联系，梁启超至少在此时必然会得知该文的存在，且作为会员完全有途径阅读会刊。其次，就梁启超阅读《论中国之将强》日译版的动机而言。该文为对梁启超作品的日译，且该文在日译过程之中梁启超没有介入，可能出于对自己作品翻译情况的好奇而阅读，亦可能因为同东邦协会及《东邦协会会报》关系而去阅读，在其加入东邦协会之后，这种动机会更大。而梁启超在赴日之后的日语学习过程之中，容易受新词影响，潜移默化而接受“中华民族”一词。故而，梁启超加入东邦协会之后，极大可能阅读过《东邦协会会报》的《论中国之将强》日译版，其中的用词可能对梁启超产生直接影响。事实上，也就是在梁启超加入东邦协会之后第 4 个月，梁启超开始使用“中华民族”一词。

（二）20 世纪初“中华民族”一词的初步传播

“中华”一词本身含义有狭义、广义两个方面，1902 年梁启超使用的“中华民族”一词，具体含义不详，但应该是狭义地指代汉族或华夏族等。随后，梁启超在 1905 年 3、4 月的《历史上

---

① 梁啓超：《飲冰室文集類編 上》，下河邊半五郎，1904 年，第 5 页。
② 任公：《饮冰室自由书·论强权》，《清议报》第 31 册，1899 年。
③ 任公：《灭国新法论（续八十六册）》，《清议报》第 89 册，1901 年。
④《新入會員姓名》，《東邦協會々報 46》，1898 年，第 145 页。
⑤《支那志士之憤悱》，《東邦協會々報 53》，1898 年，第 9–18 页。
⑥ 近衛篤磨日記刊行会编：《近衛篤磨日記》第 2 卷，鹿島研究所出版会，1968 年，第 208 页。
⑦《支那志士之憤悱》，《東邦協會々報 53》，1898 年，第 9–18 页；哀時客稿：《論學日本文之益》，《東邦協會々報 58》，1899 年，第 81–83 页。
⑧ 狭间直树编：《梁启超·明治日本·西方》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2001 年，第 472–476 页。
⑨《本會記事 新入會員》，《東邦協會々報 83》，1902 年，第 101 页。
⑩ 梁啓超：《支那近十年史論》，《東邦協會々報 83》，1902 年，第 1–21 页；清國人某：《論支那獨立之實力與日本東方政策》，《東邦協會々報 83》，1902 年，第 24–28 页。

中国民族之观察》之中，7 次使用“中华民族”一词，如：“今之中华民族，即普通俗称所谓汉族者。”① 此处的“民族”概念，严格意义上相当于“nationality”，即构成国家一部分的民族。随后，1905 年 6 月发行的《东邦协会会报》第 124 号所刊久米邦武的《论中国的建设加固》之中，2 次使用“中华民族”一词：“中国人把古代的主权者神农、黄帝一派的民族称为中华民族……中国的所谓的中华民族不常以稻米为主食”。② 相较于梁启超指代汉族的“中华民族”，该文之中“中华民族”范围更加狭隘地指华夏族。这是 1898 年之后《东邦协会会报》再次使用该词，考虑到时间问题，可能存在梁启超与《东邦协会会报》的相互影响。对于中国人而言，相较于日语文献，更容易受到汉语文献影响，梁启超使用“中华民族”一词，直接促进了该词在汉语中的传播。

1907 年 5 月杨度于《金铁主义说》之中使用该词，不同于梁启超，杨度的“中华民族”概念泛指中国各民族，“蒙、回同化之后，不仅国中久已无满、汉对待之名，亦已无蒙、回、藏之名词，但见数千年混合万种之中华民族”。③ 当时杨度同样居于日本，更重要的是同梁启超关系紧密，杨度使用“中华民族”一词，应该是受到梁启超影响。随后，1907 年 7 月，章太炎在《中华民国解》中使用“中华民族”一词，针对杨度的《金铁主义说》，认为“中华民族”仅指汉族，章太炎使用“中华民族”一词，显然是主要受到杨度影响。④《民报》为中国同盟会机关报，而章太炎为同盟会重要成员，这在“中华民族”一词传播过程之中，具有重要意义。民国建立后，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，1912 年 1 月 5 日由孙中山签名的电报通告各友邦书之中，第三段开头有：“盖吾中华民族，和平守法。”⑤ 根据该通告之中的满汉对立的内容，“中华民族”具体范围还是比较狭隘，但这是中国本土的文献首次使用“中华民族”一词。随后，“中华民族”一词迅速被大量使用，且迅速开始流行指代中国的各民族，该词语地位迅速提升。

四、结语

随着近代西方民族主义思潮的发展，民族国家率先于西方兴起，随着西方民族主义思潮的扩散，民族国家大力发展，“nation”等概念亦大力传播。汉字文化圈的国家，亦逐渐发展成为现代民族国家，社会的发展会对词汇的发展产生需求。在此背景之下，“民族”一词含义发展，逐渐具备“nation”等现代含义。在此基础之上，汉字文化圈之中，用作民族、国家等名称的“中华”“日本”等词语，会自然而然地与“民族”组词，“中华民族”一词在此背景之下出现。

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发展，中华民族的认同逐渐形成，中国逐渐发展成为现代民族国家。而相较于中国，日本近代化发展较快，逐渐成为现代民族国家，具备“nation”等现代含义的“民族”一词较早就在日语中流行；因近代中日关系密切，日语之中自然进一步较早出现“中国民族”等词语。“中华民族”一词的出现是近代中日文化相互影响演化的结果。1897 年梁启超于上海《时务报》刊载《论中国之将强》，1898 年日本东京《东邦协会会报》日语译载《论中国之将强》，将其中的“华种”译为汉字词“中华民族（中華民族）”，首次使用“中华民族”一词。梁启超流亡日本后，学习日语，阅读日语文献，其汉语用词受日语词汇影响较大。同时，梁启超同东邦协会的关系日益密切，并最终加入该协会。进一步，极大可能是由于受到《东邦协会会报》之中《论中国之将强》日译版的影响，1902 年梁启超首次于汉语文献之中使用“中华民

---

① 中国之新民：《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》，《新民丛报》第 65 号，1905 年；中国之新民：《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（续第六十五号）》，《新民丛报》第 66 号，1905 年。

② 久米邦武：《支那の修理固成を論ず》，《東邦協會々報 124》，1905 年，第 11–12 页。

③ 杨度：《金铁主义说（续第四号）》，《中国新报》第 5 号，1907 年。

④ 太炎：《中华民国解》，《民报》第 15 号，1907 年。

⑤ 上海自由社校订：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新法令》，上海自由社，1912 年，第 34 页。

族”一词。随后，“中华民族”一词进一步被部分旅日华人使用，尤其是被同盟会方面所使用。民国建立之后，“中华民族”一词正式开始在中国本土使用。

References

Du Yonghao. “Xinhai geming qianhou de ‘zhonghua minzu’ gainian” (The Concept of “Chinese Nation” before and after the 1911 Revolution). *Zhongguo bianjiang shidi yanjiu* (China’s Borderland History and Geography Studies) 3 (2012).

Hao Shiyuan. “Xinhai geming yu zhonghua minzu neihan zhi yanbian” (The 1911 revolution and the change of the connot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). *Minzu yanjiu* (Ethno-National Studies) 4 (2011).

Huang Xingtao. “Xiandai ‘zhonghua minzu’ guannian xingcheng de lishi kaocha” (A historical examination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modern concept of the “Chinese Nation”). *Zhejiang shehui kexue* (Zhejiang Social Sciences) 1 (2002).

Huang Xingtao. “Qingmo xiandai ‘minzu’ gainian xingcheng xiaokao” (A study on the formation of the modern concept of “Nation”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). Renwen zazhi (The Journal of Humanities) 4 (2011).

Huang Xingtao. *Chongsu zhonghua: jindai zhongguo “zhonghua minzu” guannian yanjiu* (Reshaping China: a study of the concept of the “Chinese Nation” in modern China). Beijing: Beijing shifan daxue chubanshe, 2017.

Shi Shuo. “Cong zhongguo lishi mailuo renshi ‘zhonghua minzu’ gainian” (Understanding the Chinese Nation in the historical context: an inspiration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otion of Chinese Nation over the last one hundred years). *Qinghua daxue xuebao* (Journal of Tsinghua University) 3 (2021).

Shi Shuo. “Huru zhonghua: ‘zhonghua’ yici de chansheng ji kaifangxing tedian” (The origin of the word “Zhonghua”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ts openness). *Qinghua daxue xuebao*(Journal of Tsinghua University) 4 (2022).

Wang Shumin. “Zhonghua minghao shuoyuan” (Tracing the origin of Chinese names). *Zhongguo lishi dili luncong* (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) 1 (1985).

Hazama Naoki. *Liang Qichao·mingzhi riben·xifang* (Liang Qichao· Meiji Japan· the West). Beijing: Shehui kexue wenxian chubanshe, 2001.

Zhang Ziqing. “Jinshi riben ‘zhonghua’ gainian de yihua” (The alienation of concept of “Zhonghua” in the early modern Japan). *Beijing shifan daxue xuebao* (Journal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) 6 (2018).

A New Study on Liang Qichao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Term *Zhonghua Minzu*

LIU Yuze (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, Shanxi University; 838471543@qq.com)

Abstract: The term “*Zhonghua Minzu*” (中华民族) has long been acknowledged by academia as first used by Liang Qichao in 1902; however,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the term appeared as early as 1898. In 1897, Liang Qichao published *On the Future Strength of China* in the Shanghai *Shi Wu Magazine* using the term “*Huazhong*” (华　种). In 1898, the Japanese journal *Touhou Association Journal* published a Japanese translation of this article, rendering “*Huazhong*” as the Chinese-character term “*Chūka minzoku*”—marking the first recorded use of the term. Subsequently, in 1902, Liang Qichao employed “ 中华民族 ” for the first time in a Chinese-language text, in his work *On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China’s Intellectual Thought*. The emergence of this term was rooted in the rise of modern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the formation of a collective identity tied to the nation-state. As Western concepts such as “nation” were transmitted to China via Japan, the term “*minzu*” evolved from traditional connotations of lineage and locality to encompass modern political and civic meanings, enabling its semantic fusion with “*Zhonghua*”. The compound “*Zhonghua minzu*” thus emerged as a new lexical construct capable of expressing a unified national identity.

Keywords: *Zhonghua minzu*, Liang Qichao, *On the Future Strength of China*, *Touhou Association Journal*, *Touhou* association